

186

中国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研究

李明军 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研究/李明军著. -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2.6

ISBN 7-80040-632-6

I. 中… II. 李… III. 古典小说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清代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2317 号

书 名: 中国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研究

作 者: 李明军

责任编辑: 张良村 刘登阁 (特邀)

装帧设计: 刘树勇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E-mail: jfjwyehs@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北京才智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9.625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632-6/I·470

定 价: 22.80 元

序

认识李明军博士，还是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那时他就立志到临沂师范学院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我们便成了同事。

在学术研究方面，我们先后走的路似乎是一样的，先是搞古代诗文，后致力于中国古代小说。只是我感到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而李明军的路却越走越宽。为什么？正当我感到困惑时，李明军送来了这部文稿，并邀我作序。读后略有所悟，便记下来交卷。

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从初期的后人为前人在原作上作序题跋，夹批评点，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对小说发展脉络的描述，至二十世纪下半叶对重要名著的集中研究和炒作，大都是文本外部的研究。宏观的是“史”，微观的是版本、作者、主题、人物、情节、结构、技法、语言等，除此似无可为。这种传统的古代小说研究方法，内容局限于这几个方面，对象只限于几部名著，所以虽然著述颇丰，却少有新意，像我这样不入流的研究者，自然感到困窘难进了。

李明军的这部文稿，一改传统的研究模式，找到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一条新路。得路者可得富矿床，可得新领域。

在方法上，本文稿尽量使名著回归本位，把整个十八世纪的全部文人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横切成像的观照，从宏观上抽取共同特点，结合十八世纪的时代文化，探究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的精神内涵，揭示十八世纪文人的群体内心世界和品格操行，总

结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的时空运作的独特模式，成功地揭示了十八世纪的时代文化特征，阐释了时代文化与小说（文学）创作的关系。

二十世纪末，小说研究界似有同仁靠近了这个领域，但都是就某一名著的或某一方面的，似是朦胧的、不自觉的，徘徊的，像李明军这样自觉地、有明确指导思想地以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新的角度对十八世纪文人小说进行全方位考察的专著，还是第一部。希望李明军沿着这条新路，继续开拓，不断有新的收获。

葛成民

二〇〇二年元月十日

目 录

序 I

绪 论 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研究的回顾 1

对十八世纪通俗小说的研究深入的过程，也是“文人小说”逐渐凸现的过程，从对单篇作品文化内涵的分析，到对一类小说共通要素的提炼，再到概念的明确提出，对通俗小说的学术性研究本身即意味着学术的推进。

第一章 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的历史背景 12

十八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给通俗小说特别是其中的文人小说以深刻的影响，频繁的军事行动、皇权政治的强化、科举制度、文字狱等等，不仅促成了文人小说的产生和繁荣，而且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学术、宗教、诗文戏曲创作等等，更是直接促进了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特质的形成。

第二章 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的发展历程 38

一、酝酿与过渡 52

随着亡国哀痛、故国之思的逐渐淡薄，对自我生命价值的关注的逐渐深入，十八世纪初文人创作的通俗小说的超功利性、抒情性也在逐渐增

强，同时对艺术形式的探索也在进行着。

二、文人小说的繁荣 57

话本小说、历史演义迅速走向衰微，具有较高素养的文人参与通俗小说创作促进了文人小说整体性格的形成和文人小说的繁荣，通俗小说成为文人抒情寄愤的重要媒介，而文人末路的伤感也逐渐融入通俗小说之中。

三、延续与发展 61

文人通俗小说创作数量上的激增伴随着质量的下降，《红楼梦》续书形成一个独特的群落，以小说见才学的倾向发展到了极致，在对文人精神世界的继续探索中，时代的脚步声渐渐清晰。

第三章 从书坊到书斋：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的创作与传播 66

一、从劝惩说到抒情说：十八世纪文人小说观念的变化 69

在对劝惩说、史鉴说的扬弃中，通俗小说抒情说逐渐成熟，通俗小说可以抒怀，可以“解胸中之闲垢”，与诗文同样为发愤之所作，因而也就同为立言之一种，同样可以传之后世以至不朽。

二、文人小说与市人小说：以儿女英雄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为例 81

以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为代表的市人小说对在家族光环照耀下的世家子弟曲尽赞扬之能事，喧杂的小说世界中不见文人的踪影，而在以儿女

英雄小说为代表的文人小说中，文人和他们的红颜知己才是真正的叱咤风云的英雄，他们的情才是“儿女真情”，在对个人事业的渴望中隐藏着文人的英雄梦。

- 三、刊刻、传抄与接受的分层：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的传播 94

由于将通俗小说创作当做个人的事业，十八世纪的文人小说家不急于刊刻自己的作品也就完全可以理解。稿本、抄本的传阅成为十八世纪文人小说重要的传播方式，与此相伴的是阅读的分层，文人成为重要的读者群，他们阅读通俗小说的严肃态度是以前罕见的，因为他们深信自己才是作者的真正知己。

- 四、文人化的阅读：以《红楼梦》的续书为例 107

续作《红楼梦》成为十八世纪后期文人阅读《红楼梦》的重要方式，从不同角度入手的续作反映了文人小说家对《红楼梦》的不同理解，或寄感慨于《红楼梦》，或借续《红楼梦》体悟自我人生，实际上是借续《红楼梦》创作自己的小说。

- 第四章 从外到内：十八世纪文人小说关注焦点的变化（上） 117**

- 一、十八世纪文人小说中的文人英雄形象及其文化内涵 123

《女仙外史》、《野叟曝言》、《绿野仙踪》、《希夷梦》等被归入完全不同类型的小说却有着明

显的共通点，文武双全、富经国大略的文人是这些小说绝对的主角，整个小说世界即为他们而营造，他们的辉煌功业正是他们的创造者的梦想。这种强烈的用世精神与同时期的诗文不谋而合，并且可于学术中寻到其根源。

二、十八世纪文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社会文化

意义 140

对女性的异乎寻常的关注和尊重是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的又一突出特点。文人小说中的女子才华出众，多文武双全，是文人英雄的强有力的后援和精神支柱，与其他类型小说比较，联系十八世纪的社会状况，可以看出这些女子英雄形象是一种理念的表达。

三、十八世纪文人小说中的爱情故事及其时代文化

内涵 152

十八世纪文人小说对情爱的高度重视和对名利的淡薄，与文人所渴求的知遇之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十八世纪文人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以及面对如此现实的无奈和自我排遣心态，而在情与欲之间的徘徊和牵强的分辨，既是哲学思想的折射，也体现了文人的矛盾心态。

四、十八世纪文人小说中所反映的文人精神世界 171

对文人才华的称扬，对文人功业的铺陈，对女子才干和品操的歌颂，如此等等都在一部据唐传奇改编的通俗小说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而把

《躋云楼》与其据以改编的唐传奇进行比较，就可窥见十八世纪文人的精神世界。

第五章 从激情到感伤：十八世纪文人小说关注 焦点的变化（中） 181

一、出世与入世之间：以《绿野仙踪》为中心 183

作为一部道教小说，《绿野仙踪》几乎涉及了道教小说所有的基本母题和道教的基本观念，但作者对出世长生的渴望显然无法压抑胸中的济世之火，冷于冰可以说是矛盾徘徊于济世、出世间 的十八世纪文人的象征。

二、从激情到感伤：以《希夷梦》为中心 199

文人的普遍的穷愁不遇的背后是儒家理想的破灭。在出与处的二难选择中，文人被迫选择了后者，因而也就失去了精神上的依托，成为精神世界的孤独者，缠绵的感伤化为强烈的悲哀。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希夷梦》成为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的代表。

第六章 从道德劝戒到社会政治批判：十八世纪 文人小说关注焦点的变化（下） 213

一、摇摆于道德劝戒和娱乐之间 213

自白话小说诞生之日起，道德劝戒和娱乐大众即似乎是一种矛盾，而在二者之间的摇摆和艰难选择，决定了白话小说在不同时期的品格。十八世纪的文人小说于两难之间找到了另一生路。

二、文人情怀抒写中的社会政治批判 221

将道德问题提高到社会政治批判的高度，与文人的济世情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社会政治批判在个人情怀抒写中实现，成为自我表现的方式之一，是十八世纪文人小说接触现实的独特方式，而《儒林外史》、《何典》、《钟馗平鬼传》可以说代表了十八世纪文人小说讽世的几种形态。

第七章 文人化的叙事：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的叙事艺术 238

一、人称、语调与视角：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的叙事方式 239

对人称、视角等的有意识控制，在十八世纪文人小说中属罕见的特例，十八世纪文人小说家更直接地借鉴话本体制，让叙述者更明显地介入小说世界，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而这一切与书斋化的创作息息相关。

二、传奇的世界：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的时空运作 245

十八世纪的文人小说中充满了时间概念，却缺乏真正的历史时间，对主人公一生的描述也只是假象；充满了空间概念，而空间更多的是象征意味，特别是自然风景被挤到了小说世界的一隅。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的世界是一个传奇的世界。

三、类型与性格之间：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的人物塑造 253

人物形象缺乏鲜明的性格特征，因而也就谈

不上发展与成长，十八世纪文人小说中的人物好像小说公式中的常数，其生活和命运才是真正的变数。平面化的讲述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而这种介于类型和性格之间的人物形象，与文人小说的创作意图不谋而合。

四、感伤的旅程：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的漫游模式 264

漫游对十八世纪文人小说来说具有双重意义，既是结构情节最有效的方式，又对小说主题构成有重要意义，小说主人公的漫游，实际上是文人心灵的漂泊。

五、泰伯祠和大观园：时空位移中的心灵意象 274

作为十八世纪最伟大的两部小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成功地运用了时间和空间，泰伯祠和大观园即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时空体，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意象代表了十八世纪文人的两种精神世界，决定了两部小说完全不同的主旨。

后 记 293

绪论 十八世纪文人 小说研究的回顾

对十八世纪通俗小说的研究深入的过程，也是“文人小说”逐渐凸现的过程，从对单篇作品文化内涵的分析，到对一类小说共通要素的提炼，再到概念的明确提出，对通俗小说的学术性研究本身即意味着学术的推进。

十八世纪是通俗小说的繁荣时代，因此通俗小说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时，十八世纪的通俗小说也就开始受到特别的重视。总的说来，对十八世纪通俗小说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的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可以说是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研究的积累酝酿阶段。十八世纪的多数通俗小说在出版时或出版后不久，即有人为之作序写跋，加上批注，这是一种小说批评形式，如《女仙外史》前面陈奕禧的序言，书后叶萼的跋、刘廷玑的品题，各章后所附杨颤的评论，最早的《幻中真》刊本中的圈点和句旁批语，《金石缘》书后的总评，《野叟曝言》毗陵汇珍楼活字本中的知不足斋主人序言、回后总评及双行夹批，《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中的闲斋老人序、每回后的评语，《红楼梦》各抄本中的评语，《绿野仙踪》现存抄本中陶家鹤、侯定超的序言、虞大人的总评，《飞龙全传》崇德书院刊大字本的回末总评，《希夷梦》前的自序、吴云北序，《岭南逸史》嘉庆十四年刊本前的西园序、每回之后所附的醉园、西园、琢斋、竹

园、启轩、李梦松等人的评语，等等，虽然大都是肤浅的、零散的随感式点评，但是它们为后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资料，而且其中也时见精到的见解，如闲斋老人对《儒林外史》主旨的概括几乎成为对《儒林外史》的经典概述，西岷山樵在序言中称《野叟曝言》是作者“抒写愤懑”之作，“寄托深远”，可谓一语中的。另外在一些杂记和诗文集中也保存或转录了一些相关资料，如袁枚《随园诗话》、李斗《扬州画舫录》、《松风阁笔谈》、敦诚《鵠鵠庵杂志》、金武祥《粟香三笔》、孙静庵《栖霞阁野乘》、俞樾的《茶香室丛钞》、徐珂《清稗类钞》等。这些片段中有关于小说或小说作者的有价值的资料，如敦诚的《鵠鵠庵杂志》、《四松堂集》，敦敏的《懋斋诗钞》等为研究《红楼梦》的作者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原始资料；有对小说主旨和艺术的言简意赅的评价。

真正的研究应该是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从二十世纪初到“文革”前期是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研究的初兴期，在晚清小说界革命的旗帜下，小说被与政治和改造社会联系在一起，通俗小说也随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最初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受西方小说史观念影响的学者，自觉地研究中国小说的第一步，就是勾勒中国小说发展的脉络，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产生的。在各类小说史中，十八世纪文人小说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被阿英誉为小说史和考证书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十八世纪的人情小说、讽刺小说以及表现才学的小说作了精到的论述。从整体上说，这一时期主要是介绍和综述性的研究，以及对一些小说作者和小说版本的初步考证。如对《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作者身世的考证，对《野叟曝言》、《歧路灯》、《绿野仙踪》等小说及其作者的介绍，对小说版本的初步搜集整理和考证，另外还有对故事本事的考原，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鲁迅、胡适、俞平伯、赵景深等小说研究者，他们对

十八世纪小说的研究为后来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是对一部小说的系统深入研究，具有开创意义。

“文革”后期至八十年代中期，是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研究的兴盛时期，特别是对《儒林外史》、《红楼梦》、《歧路灯》等名著的研究已经形成规模。《红楼梦》研究学会、《儒林外史》研究会相继成立，研究《红楼梦》、《儒林外史》、《歧路灯》的刊物相继创办，大型的专题研讨会开始定期举行。从研究的方向上说，这一时期主要是对十八世纪小说的版本、作者作进一步的考证，对小说的主旨作多角度的探索，对小说的艺术进行深入的分析总结。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红楼梦》作者家族、籍贯、生卒年月的探讨，新的材料从最原始的档案中被发掘出来，对小说不同版本的考察也成为红学研究的热点。对于《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小说主题的探讨，逐渐从对它们反封建、反理学、反科举思想的揭示转向社会文化及人生的剖析；对于它们的艺术成就的总结，主要集中在结构特点和各种描写技巧上，与传统的关系，如史传文学的影响，诗文因素的渗透，等等。

八十年代后期至今，可以说是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研究多元化发展的时期。针对前一阶段外围研究过多而内部研究偏少的现象，也是受到西方一些文本分析理论的影响，有的研究者呼吁回归文本，对小说本身进行细读式的批评。但是一些外围问题，如吴敬梓和曹雪芹的家世，《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因为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所以在这一时期仍然是讨论的焦点之一。当然，虽然偶尔仍有点滴资料被发现，不可置疑的是，原始资料已被发掘殆尽，要发现新的材料已经非常困难，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侧重文本考察，如对小说主旨的进一步开掘、从新的角度对小说的艺术特征进行分析总结。从研究方法上说，这一时期传统方法和现代小说理论并用，文化批评盛行一时，三教哲学被用于小说主旨的揭示，产生了一大批谈论十八世纪小说文化内涵的文章和著

作，叙事学理论被广泛应用在小说研究上。值得肯定的是，一些次要的小说开始受到研究者的注意，过分集中于几部大著作的现象开始有所改变。

虽然如话本、演义故事、公案侠义等接近市民大众的小说类型也是学者们研究的对象，但研究明显集中在文人创作的小说上，而对文人小说研究深入的过程，也是对这些小说的文人特性认识深入的过程。与十六、十七世纪通俗小说相比，十八世纪的这类小说作为个人的创作，一开始就没有被归入市民文学或俗文学范围。如鲁迅称《野叟曝言》“以小说为度学问之具”，称《蟫史》为以小说见才藻之美者，即触及到了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的自我表现问题。^① 郑振铎在《清初到中叶的长篇小说的发展》中对清中期的文人小说作了精彩的论述，他认为《水浒传》、《西游记》等都没有脱离原始期的式样，而清初的小说也“都还是被拘束于明代小说的作风之中”，没有脱离明人的规模，到乾隆一代，文人创作的小说才一改面貌，“他们是要写出自己的经验与生活的；他们是要写出自己那一个阶级的理想与现实的……这是第一次，文人们把自己阶级的理想与丑相向读者们披露出来，他们不复以娱乐他人或慰安自己的游戏的态度去写什么；他们开始以‘一把辛酸泪’，以自己的血，以自己的心，以自己的情感与回忆来写，于是，在我们的小说坛上便出现了一个新的境界。”^② 八九十年代以来，有的研究者从《儒林外史》等十八世纪的小说中探知十八世纪的文人心态，是把它们作为典型的文人小说进行研究的，例如朱泽吉《吴敬梓的用世思想与〈儒林外史〉的主题》

^①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五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

^② 见《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第 46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

联系吴敬梓的经世思想解读《儒林外史》，^① 傅继馥《一代文人的厄运：〈儒林外史〉的主题新探》将《儒林外史》作为那个时代文人精神的载体，^② 类似的文章还有韩石的《披洒在落照时分的心灵之光：论〈儒林外史〉中一种新的生活理想及其时代和声》，^③ 陈美林《知识分子人生之路的探索》等。^④ 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如王政《论曹雪芹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刻矛盾》、^⑤ 吴建国《〈红楼梦〉的文化选择与心理困惑》、^⑥ 唐富龄《失落与追寻：〈红楼梦〉的悲剧意识》^⑦ 等都是把《红楼梦》作为典型的文人小说，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解释其中的文人情结。张俊先生的《清代小说史》对清中期的小说作了点面结合的把握后，在概论和对神怪小说、世情小说、儿女英雄小说的思想艺术总结中，指出清中期小说的主要特征就是文人化色彩。^⑧

但是明确提出“文人小说”概念则要迟一些。有的研究者称清代中叶文人创作的小说为士大夫文学或士人小说，如孙逊在《明清小说论纲》中说：“……小说自从民间的土壤里破土而出，它又从市民文学逐渐变成为上层文人士大夫的文学，至此社会审美趣味又为之一变……”^⑨ 王进驹在《士人文学的高峰：从小说类型特征看〈儒林外史〉的成就》中称《儒林外史》为“士人小

^① 见《河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1期。

^② 见《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③ 见《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2期。

^④ 见《江淮论坛》，1994年第8期。

^⑤ 见《汕头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1期。

^⑥ 见《华东师大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1期。

^⑦ 见《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1期。

^⑧ 张俊《清代小说史》第四章第一、四、五节，第五章第一节，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⑨ 见孙逊《明清小说论纲》，第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说”，^① 宁宗一在《从小说文体演变看〈儒林外史〉与〈红楼梦〉的类型品位》中则称《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为“作家小说”和“学者型小说”，以与此前的“小说家”小说相比照。^② 美国学者夏志清在一篇题为《文人小说家和中国文化：〈镜花缘〉研究》的文章中将展示学识的《镜花缘》称为文人小说。^③ 美国学者浦安迪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将明代的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称为“文人小说”，并从中探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④ 他的分析有不少独到之处，但称它们为“文人小说”并认为其中蕴含文人深藏于其中的寓意，则值得商榷。浦安迪在《逐出乐园之后：〈醒世姻缘传〉与十七世纪中国小说》中又写道：“我把这四部作品十六世纪的完整形式看做我愿称为‘文人小说’的例子（以‘文人画’，‘文人剧’类推）——这是一种与流行观点相反的见解……”^⑤ 何谷理在《明清文人小说中的非因果模式及其意义》中就“文人小说”发表了很好的见解：“一部文人小说的创作，通常要花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许多作家极为关注国事政局，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个人的看法；另有一些作家则留意于当时的道德和哲学问题。文人小说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时时可见严肃的理性思考和艺术追求。”^⑥ 只是这些说法用于十八世纪的文人小说才更为合适。国内的研究者也提出了“文人小说”的概念，如

① 见《广西师院学报》（哲社），1993年第1期。

② 见《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4年第1期。

③ 见《中华月报》，1974年第710期。

④ 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

⑤ 见《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第31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⑥ 见《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第47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